

## 怀璧其罪：中国在非洲推行“债务陷阱式外交”？

卢凌宇 古宝密

**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迅猛发展。一些西方政客和分析人士指责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与援助致使非洲国家的外债迅速攀升，增加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同时通过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投资与控股，引诱非洲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影响相关国家的外交政策。实际上，目前非洲国家的外债源于其经济发展结构和债务管理水平等内部因素，与外来直接投资下降和全球经济疲软等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的投资与援助并没有显著地增加非洲国家的外债压力。一方面，中国免除非洲重债穷国的债务负担或进行债务重组，而非占有这些国家的资产；另一方面，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鼓励私人企业到非洲投资，增强非洲国家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了应对西方的无理指责，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在非洲的多领域、多层次的经济合作，既能实现投资流向的多元化、降低投资风险，又可减轻非洲国家的疑虑；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强与非洲国家及西方媒体的沟通，加大外宣工作的力度。

**关键词** 中非合作 “债务陷阱式外交” 投资 援助

**作者简介** 卢凌宇，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昆明 650091）；古宝密，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上海 201620）。

“债务陷阱式外交”（Debt-trap Diplomacy）成为近年来国际上部分人指责中国对非洲投资与援助的高频词。他们指责中国的投资与援助是在制造债务陷阱，宣称中国不顾项目所在国的债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通过对一些项目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与援助，加重东道国的债务负担，直至该国无力偿还债务，从而取得对该项目或领域控制权，进而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这种指责不仅

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在非洲进行投资与援助的焦虑，也折射出他们对目前非洲国家的债务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

为了呈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和投资的实际情况，澄清外界对中国与非洲国家正常经济合作的误解，驳斥相关无理指责，本文拟梳理和分析西方人士指责中国在非洲推行“债务陷阱式外交”的观点，提炼出他们的核心论调；通过对目前非洲国家债务危机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行简要分析，并基于中国对非洲援助和投资的事实和数据，对上述指责分别进行反驳；同时对中国优化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 所谓中国对非“债务陷阱式外交”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迅猛发展。尤其是在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进一步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和援助力度，并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Bank，以下简称“亚投行”）。尽管上述多边的、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受到了众多相关国家的欢迎和积极评价，但也引起了部分西方政客和分析人士的焦虑和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强化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经济的影响，导致了中国对非洲援助和投资以及非洲国家外债迅猛增长。如 2006 ~ 2009 年非洲外债存量年均增长 7.8%，2011 ~ 2013 年年均增长 10.2%。<sup>①</sup> 而自 2013 年以来，非洲大陆债务高风险国家的数量翻了一番，目前已达到 18 个。<sup>②</sup> 据此，他们指责中国投资与援助致使非洲国家的外债不断攀升，认为中国正在非洲实行“债务陷阱式外交”，推行新的帝国主义——“债权帝国主义”。上述指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 （一）中国政府的援助和贷款增加了非洲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

主权债务（Sovereign Debt）一般是指主权国家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为补充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等公共支出而对外借款所产生的偿还义务。

---

<sup>①</sup> UNCTAD,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6*,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6, p. 2.

<sup>②</sup> Landry Signé, “The State of African Economies: Insights from the IMF and World Bank Spring Meetings”, April 24,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8/04/24/the-state-of-african-economies-insights-from-the-imf-and-world-bank-spring-meetings>, 2019-05-11.

债权人可以是其他国家，也可以是国际组织或机构。从统计数字上看，非洲国家主权债务在扩大的同期，中国对非洲贷款与援助的规模也在扩大。据此，部分西方政客和分析人士认为是中国对非洲的贷款与援助造成了非洲国家主权债务迅速增长，特别是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及随后成立的亚投行更是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New Delhi-based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以中国近年来援助建设或收购的吉布提和肯尼亚蒙巴萨等海上港口要冲为例，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债务陷阱”相挂钩，认为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和大规模的贷款与援助诱使许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sup>①</sup> 这些国家为了避免出现债务违约，迫于压力向中国让渡本国部分主权及资源，因此切拉尼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构建帝国主义计划的一部分。<sup>②</sup> 简言之，切拉尼的观点是中国凭借主权债务强迫他国“臣服”。由于近些年非洲国家债务的急剧上升与中国对非洲大规模的贷款和援助几乎同期，这似乎是成了中国在非洲推行“债权帝国主义”的“铁证”。

切拉尼所谓的“债权帝国主义”一经提出，就在一些西方媒体上引发了“共鸣”。一些媒体的报道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在非洲的贷款与援助对非洲债务可持续的影响表示深度担忧。<sup>③</sup> 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还评估了被确定为“一带一路”倡议借款方的68个国家可能潜在的债务问题。<sup>④</sup> 他们主要担心大规模的贷款与援助计划将使这些原本就已债务累累的国家的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进一步降低；也有人担心债务问题会使债务国对作为债权方的中国产生不同程度的依赖，尤其在2017年，中国更是被集中地指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推行“债务陷阱式外交”。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在2018

---

<sup>①</sup> 杨思灵、高会平：《“债务陷阱论”：印度的权力政治逻辑及其影响》，载《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第55~81页。

<sup>②</sup> Brahma Chellaney, “China’s Creditor Imperialism”, Jan. 1, 2018, <https://chellaney.net/2018/01/01/china-creditor-imperialism>, 2019-05-11.

<sup>③</sup> Heydarian, Richard Javad, “China’s Silk Road Project: A Trap or An Opportunity?”, *Silk Road Al Jazeera*. May 17, 2017. ; Krakowska, Małgosia,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 A Push for influence or Debt?”, *New Eastern Europe*, October 7, 2017; Zhang, Shu, and Matthew Miller, “Behind China’s Silk Road Vision: Cheap Funds, Heavy Debt, Growing Risk”, *Reuters*, May 15, 2017.

<sup>④</sup> John Hurley, Scott Morris, and Gailyn Portelance,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CGD Policy Pape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18.

年访问非洲时，几乎每到一站都会论及非洲国家债务上升的问题，他指责中国利用腐败和掠夺性贷款破坏非洲各国政府，使非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sup>①</sup>

总体而言，上述指责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倡议或组织，不顾非洲国家的实际债务状况，有计划地对非洲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和关键行业或领域进行大规模的贷款或援助，加重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恶化债务风险，进而迫使这些国家为了避免主权债务违约，不得不将港口、矿产资源或通信等重要行业的部分国家主权让渡给中国。

## （二）中国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

部分西方政客和分析人士对中国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的第二条指责是，尽管中国在非洲进行投资的主体是企业，但大部分企业受中国政府的控制或主导，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受中国政府的资助或控制的国有企业更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击败竞争对手而取得主导地位，甚至还有可能垄断一国市场，这意味着表面上在非洲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是企业，而实质上却是中国政府主导或控制着非洲国家的市场。

早在2013年，美国兰德公司（RAND）就发表报告，对中国在非洲、中东和中亚等地区的援助和政府资助的投资活动的规模、趋势与构成进行了评估，认为在2004年之前，中国对非洲援助和投资的许多方案都侧重于“其他”形式（例如，取消债务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从那时起，特别是在2003年和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之后，中国的援助和投资领域转向了自然资源（如石油、黄金和铀）开发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包括非洲的水电、公路和铁路项目。<sup>②</sup>在石油资源等自然资源开发领域，主要的投资商是中石油、中海油和中石化等受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而中国政府对非洲的很多援助来自这些国有企业的财政支持和技术支持。<sup>③</sup>贷款尤其是优惠贷款是确保获得所需资源和为主要的中国建筑公司提供信贷的一个关键手段。<sup>④</sup>据

---

① Abdi Latif Dahir, Yomi Kazeem, “China is Pushing Africa into Debt, Says America’s Top Diplomat”, *Quartz Africa*, March 7, 2018.

② Charles Wolf, Jr., Xiao Wang, Eric Warner, *China’s Foreign Aid and Government – Sponsored Investment Activities: Scale, Content, Desti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RAND Corporation, 2013, p. xv.

③ *Ibid.*, p. 11.

④ Chris Alden, Lu Jiang, “Brave New World: Debt, Industrialization and Security in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3, 2019, p. 642.

此，一些政客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利用这些国有企业对非洲国家重要的经济部门或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掠夺非洲的资源。

《纽约时报》在2018年6月的一份报道中，直接指责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活动具有政治性，警告中国企业不能以不利于美国企业参与竞争的方式在非洲经营公路、铁路和海上运输，并提出这些基础设施虽是中立的，但其运作则颇具政治性；当中国公司建设非洲国家的港口时，这本身似乎并无问题，但当东道国被迫将业务移交给中方时，国家安全问题就产生了。<sup>①</sup>他们还认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与港口、公路和铁路等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样，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东道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中兴通讯、华为公司等电信企业在非洲地区非常活跃，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政府获取手机网络和数据之忧，因为这些大型的电信企业被认为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中国政府的资助或控制。

上述指责并不认可中国企业在非洲经济活动中的市场自主性。他们认为这些企业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受到中国政府的管理与控制，担心西方的企业与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使中资企业在某些领域或项目中处于主导地位。换言之，这些中国企业在非洲东道国的投资行为在本质上就是国家的投资行为，东道国对企业的借贷实际上就是向中国政府的借贷。当东道国由于债务不断累积上升，无力清偿债务而被迫将该项目或业务移交给中国企业时，实际上是移交给中国政府。据此，他们指责中国企业在非洲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尤其是对关键行业领域的投资，其实是在给非洲国家制造“债务陷阱”。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两条指责针对的是不同的主体，前者更倾向于政府，后者则是企业，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交集。具体而言，政府作为一个政治行为主体，无法直接参与外国的市场经济活动。它对外国市场活动的参与，无论是贷款还是援助，一般都是以企业作为依托，因此这些企业在非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实质上是受政府控制的。

综上所述，这些指责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政府不顾非洲国家已有债务负担，通过企业对非洲国家的一些关键项目或行业进行大规模的贷款、援助和投资，显著增加了非洲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当非洲国家的主权债务累积到一定程

---

<sup>①</sup> Maria Abi-Habib, “How China Got Sri Lanka to Cough Up a Port”, *New York Times*, June 25, 2018.

度，无力偿还而被迫将这些关键项目或业务移交给中国的企业时，中国政府就取得了对这些关键项目或业务的控制权，并藉此影响该国的内政和外交。

从目前非洲国家的债务发展状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处于中度或高度债务危机中，非常令人担忧。中国在这次新兴债务危机中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被指责为在非洲推行“债务陷阱式外交”。然而，这种指责从未令人信服地被论证过。一些分析人士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指责罔顾了中国对非洲援助与投资的实际情况，仅仅是对未来的猜想与假设。<sup>①</sup> 这些指责的假设似乎是当它投资或援助的伙伴国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国正将自身的经济或地缘战略利益最大化。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有必要对此次非洲国家外债的特点及成因进行考察与分析。

## 当前非洲国家外债的总体特点及成因

二战后，许多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纷纷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其债务也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逐渐累积，在1970年至1999年期间增加非常显著。<sup>②</sup> 非洲国家的外债支付危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非洲国家债务纷纷到期，恰逢其经济发展遭遇困境，使它们难以按期偿还债务，随之深陷债务链。按世界银行统计，1970年全非外债总额只有70亿美元，1980年也只达到480亿美元，但至1989年非洲的外债规模已突飞猛进为2530亿美元。<sup>③</sup> 从负债率来看，非洲国家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则从1980年的30%急剧上升到1987年的83%，此后一路上扬，直到2000年达到103%。<sup>④</sup> 从债务清偿率来看，债务负担已完全超过这些

<sup>①</sup> W. Gyude Moore, “The Language of ‘Debt - trap Diplomacy’ Reflects Western Anxieties, Not African Realities”, *Quartz Africa*, September 17, 2018; UNCTAD,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6*,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6; 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88~99页;刘爱兰、王智烜、黄梅波:《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载《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3期,第163~174页;杨思灵、高会平:前引文。

<sup>②</sup> UNCTAD, *Debt Sustainability: Oasis or Mirage?* 2004,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4.

<sup>③</sup> 谈世中:《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sup>④</sup> Bill Battaile, F. Leonardo Hernández, Vivian Norambuena, “Debt Sustainabi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Unraveling Country - Specific Risk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523, 2015, p. 4.



国家的承受能力。<sup>①</sup> 自此，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积重难返。<sup>②</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非洲外债规模先抑后扬，再现债务危机，其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债务国的内因，也有国际环境的外因。

### （一）非洲的外债规模

在 2000 年至 2008 年期间，非洲国家国民经济强劲增长、汇率升值、财政收支状况改善，以及国际机构“重债穷国减债计划”（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Initiative, HIPC）和多边减债倡议计划（Multilateral Debt Relief Initiative, MDRI）的实施，使很多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明显下降。其中，加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等七国在债务减免后债务水平迅速下降，国家外债占比重从债务减免前的平均 75% 降至 26%；2006 ~ 2007 年，非洲国家的平均债务降幅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8%，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 4.8%。<sup>③</sup> 但部分国家的外债存量仍然很高，在短短几年内就恢复到实施“重债穷国减债计划”以前的债务水平。<sup>④</sup> 尽管这些减债计划一直在继续实行，但总体而言，非洲国家的债务依旧存在，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2005 年的外债就已达到 2 347 亿美元（参见图 1）。

自 2008 年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非洲国家的外债存量增长迅猛（参见图 1）。据世界银行统计，仅 2017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外债总额就已达到 5 550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了 15%。<sup>⑤</sup> 对债务持续增长的担忧并没有减缓非洲国家的债务积累，从“重债穷国减债计划”和“多边减债倡议”中受益的 30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综合外债存量在 2017 年上升了 11%，而在 2016 年只上升了 7%，它们的外债存量自 2010 年以来翻了一番。非洲国家外债存量的增长超过了经济的增长，对债务清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截至 2017 年底，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外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

---

① 唐宇华：《八十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与国际减缓措施》，载《世界经济》1990 年第 8 期，第 67 页。

② Joshua E. Greene and Mohsin S. Khan, “The African Debt Crisis”, 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Special Paper 3, 1990, p. 1.

③ Bill Battaile, F. Leonardo Hernández & Vivian Norambuena, “Debt Sustainabi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Unraveling Country-Specific Risk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523, 2015, pp. 11-12.

④ Dino Merotto, Tihomir (Tish) Stucka and Mark Roland Thomas, “African Debt since HIPC: How Clean is the Slate?” MFM Discussion Paper, No. 2, 2015, p. 9.

⑤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2019*,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8, p. 6.

34.2%，较上年32%略有上升，然而这仍比2010年高出了50%；2010~2017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民总收入平均增长23%，而同期的外债存量增长了90%；2017年外债占出口收益的比率为138%，是2010年70%的将近两倍，其中撒哈拉以南有一半非洲国家的外债占出口收益比率超过150%。<sup>①</sup>201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债总额继续攀升至5850亿美元。毋庸置疑，非洲国家外债负担日益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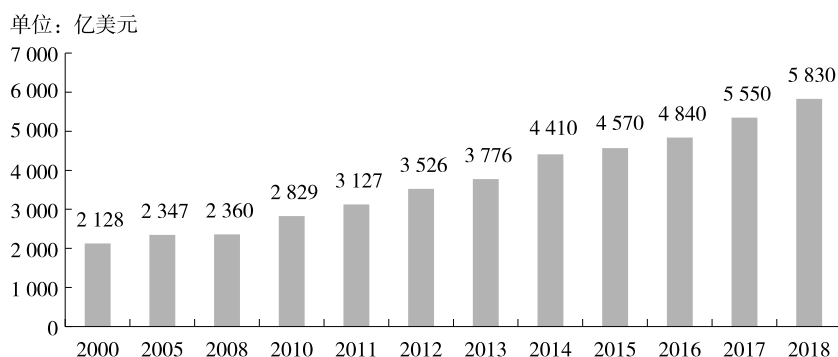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1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债规模的变化

资料来源：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2017*,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6, p. 33;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2020*,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9, p. 23.

## (二) 非洲的外债结构

与之前相比，此次债务危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债务的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来自传统的双边或多边债权方的融资比例虽下降，但依旧是非洲大多数国家融资的重要来源。传统的双边或多边债务在长期外债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2010年的44%降至2017年底的34%；作为巴黎俱乐部成员的双边债权国的长期外债份额明显下降，2017年底，巴黎俱乐部债权国仅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长期公共和公共担保外债存量的5%，仅为2010年底的1/4。<sup>②</sup>第二，优惠债务（原始赠款达到或超过25%的贷款）占外债总额的比例下降。在33个非洲重债穷国中，2011~2013年优惠债务占外债总份额不到50%的只有7个国家，而至2015年12月底，则有16个国家。总的来说，非

<sup>①</sup>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2019*, p. 10.

<sup>②</sup> Ibid., p. 11.



洲优惠债务占外债总额的加权比例从 2006 ~ 2009 年的 42.4% 下降到 2011 ~ 2013 年的 36.8%。<sup>①</sup> 第三，向私人债权人的融资显著增加，非优惠债务明显上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非洲国家的融资来源更加多样化，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国际投资者作为主权融资的额外来源。2009 年以前，很少有非洲国家发行主权债券，2010 ~ 2012 年，债券发行温和增长，每年发行 15 亿至 25 亿美元，到 2014 年，非洲国家发行的债券已增至 62.5 亿美元；国际主权债券的总存量从 2008 年的 10 亿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180 多亿美元。<sup>②</sup> 至少有 14 个国家发行了国际主权债券，平均份额为 10 亿美元，平均期限为 10 年，平均利率为 5% ~ 10%。<sup>③</sup> 最后，与国际融资渠道多样化相伴而来的是非洲国家外债货币组成的多元化。非洲国家持有美元、欧元、瑞士法郎、英镑、日元和特别提款权，以及一系列多种货币和其他货币组成的债务。2011 ~ 2013 年，博茨瓦纳、南非和马里等众多非洲国家所持有的多种货币外债占其总外债的 40% 以上。<sup>④</sup>

### （三）非洲外债形成的原因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非洲外债问题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内部因素而言，外债增加深受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方面，一方面，自 2000 年以来非洲经济增长强劲，不少国家在此时期选择了高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发展方案，政府的财政支出不断扩大，支出的增长超过了税收的增长，外债数额由此不断累加。另一方面，非洲大陆出口的商品仍然是以矿石等初级产品为主的大宗商品，产品结构缺乏弹性，极易受国际贸易环境的影响。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2009 年非洲大陆商品贸易余额赤字为 177.3 亿美元，2013 ~ 2016 年，非洲商品出口额持续负增长，对外商品贸易逆差扩大，2016 年逆差达到 1 453.6 亿美元。<sup>⑤</sup> 非洲国家的债务也随之飙升。

---

① UNCTAD, op. cit., pp. 23 - 27.

②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Staying the Course*, Washington, D. C., 2014.

③ Tyson Judith, "Sub-Saharan Africa International Sovereign Bonds: Part II",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5, p. 16.

④ UNCTAD, op. cit., p. 36.

⑤ 朴英姬：《金融危机后非洲经济发展的新变化》，载《国际论坛》2018 年第 6 期，第 47 页。

在债务管理方面，非洲国家正走向由市场主导的债务。尽管增加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能够为非洲国家提供巨大的潜在收益，可以补充国内储蓄不足、进一步使投资者的构成多样化和延长临到期的债务期限等，但是，大规模地对外发行国债也使非洲国家外汇风险显著增加，使这些国家面临未来货币贬值、偿债成本飙升的风险。世界银行非洲首席经济学家佐法克（Albert Zeufack）表示，债务结构的变化使非洲国家面临新型风险。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市场导向风险，而各国并“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sup>①</sup> 2014年，加纳和尼日利亚货币大幅度的贬值就验证了上述观点。虽然非洲国家向国际社会发行长期的国家主权债券可以助其减少短期偿还负担，但这也对这些国家对长期债务管理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事实上这些非洲国家尚未具有足够的管理能力。

就外部因素而言，非洲国家的外债规模和偿债能力也深受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外部资金流入减少和主要货币汇率变化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前景黯淡。欧元区国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复苏乏力；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重刺激国内需求，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制造业和贸易增长疲软，抑制了全球的需求和投资，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骤降，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前景和国家债务产生了负面影响。<sup>②</sup> 伴随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而来的是对非外来直接投资的下降。2011年非洲的外来直接投资额为388.40亿美元，除了2014~2015年有所上升外，而出现逐年下降之势，至2017年时只有157.22亿美元，仅为2011年的40.5%。<sup>③</sup> 外部资金流入减少迫使非洲国家利用其他融资渠道进行融资，举借外债成为重要选项。外债的货币组成与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对非洲债务危机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国家以某一种外币持有的债务越多，该国就越容易受到该货币国家的潜在汇率、宏观经济和政治冲击的影响。<sup>④</sup> 本币相对于外币的贬值而导致债务利息支付突然增加，提高了非洲国家偿债的

---

① Landry Signé, “The State of African Economies: Insights from the IMF and World Bank Spring Meetings”, April 24,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8/04/24/the-state-of-african-economies-insights-from-the-imf-and-world-bank-spring-meetings>, 2019-05-13.

②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6*,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6, pp. 5-6; Bill Battaile, F. Leonardo Hernández, Vivian Norambuena, “Debt Sustainabi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Unraveling Country-Specific Risk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523, 2015, pp. 25-26.

③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2019*, p. 12.

④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6*, Geneva, 2016, p. 36.

成本，削弱了其偿债能力。截至 2017 年底，非洲国家到期的国际债务与全球利率的上升，似乎使非洲外债占出口比例保持上升态势，更加剧了人们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sup>①</sup> 此外，在外债总额中，长期债务比例的下降和短期债务比例的上升缩短了偿债的期限，对非洲国家的偿债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市场化导向的债务累积还可能与国内的短期发展相结合，放大再融资的风险，导致公共开支突然减少，对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后果。<sup>②</sup>

综上所述，与以往相比，此次非洲国家债务危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非洲国家的内部因素与国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非洲国家债务水平大幅度上升。由于中国近年来在非洲进行大规模投资与非洲国家债务的迅猛增加几乎同步，因此部分政客和分析人士据此认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就是在制造债务陷阱，指责中国正在非洲推行“债务陷阱式外交”。二者貌似同步，但内在逻辑和事实并非如此。

## 中国对非资金合作未造成所谓非洲“债务陷阱”

如前所述，当前非洲国家面临的巨额外债主要是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造成的，债务的组成相比以往也发生了改变。据统计，在整个非洲地区近 6 000 亿美元外债中，38% 是商业银行贷款<sup>③</sup>，36%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借贷，其余 26% 是双边途径或其他国家政府的借贷，中国对非洲的借贷只占这 26% 中的一部分；<sup>④</sup> 中国的整体贷款额为 45 亿美元，其中赠款金额占 30%。<sup>⑤</sup> 显而易见，中国在非洲国家外债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一些西方媒体对于非洲债务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报道和言论，既充满偏见，又与事实不符。

---

①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2019, pp. 10 - 11.

② Dino Merotto, Tihomir (Tish) Stucka and Mark Roland Thomas, *op. cit.*, p. 9.

③ 在商业银行中，贷款份额最大的投资银行依次是英国的巴克莱银行 (Barclays)、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 (Calyon)、美国的花旗银行 (Citibank)、比利时联合银行 (KBC)、美国的摩根大通 (JP Morgan) 和法国的兴业银行 (SocieteGenerale)。Dino Merotto, Tihomir (Tish) Stucka and Mark Roland Thomas, “African Debt since HIPC: How Clean is the Slate?”, MFM Discussion Paper, No. 2, 2015, p. 12.

④ 杨优明：《非洲债务问题的真相》，载《世界知识》2019 年第 2 期，第 58 页。

⑤ Dino Merotto, Tihomir (Tish) Stucka and Mark Roland Thomas, *op. cit.*, p. 12.

### （一）中国没有加剧非洲国家主权债务风险

在前述指责中，部分西方政客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援助致使非洲国家债务激增，加剧非洲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实际上，无论是从中国对非洲援助或贷款的金额数量、行业领域，还是债务国未能偿债的结果来看，这个指责都罔顾了事实。

第一，中国对非援助和投资金额被夸大。在援助金额方面，2000 年，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做出了同“重债穷国减债计划”大体相同的承诺，减少或免除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以及重债穷国的债务。随后，中国更是择机免除重债穷国到期而无法偿还的政府债务。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政府通常是以贷款的形式向非洲国家进行援助。在对外宣布提供贷款的时候，经常使用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年限，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通常是按年度计算的。因此，国外媒体在解读中国对外援助时难免会产生误解，把中国数年的贷款数额当作是一年的贷款数额，进而夸大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贷款。此外，中国的货币单位是人民币，而国际社会通用货币单位是美元，这经常使媒体误把人民币元当成美元，<sup>①</sup>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被明显夸大了。

就投资额而言，在流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中，欧盟和美国仍然是主要的投资来源。2012 年欧盟和美国分别占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的 26% 和 9%，而 201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 1.5%。2013 年，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31 亿美元，占全球在该地区投资的 7%。<sup>②</sup> 总体来看，西欧仍是非洲最大的资本投资来源地，2015 年投资达 301 亿美元，占非洲市场份额的 45%；美国是非洲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最大来源国<sup>③</sup>，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存量远超中国。<sup>④</sup> 实际上，2016 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为 400 亿美元，排名位居于美国（对非投资额 570 亿美元）、英国（550 亿美元）和法国（490 亿美

<sup>①</sup> Brautigam Deborah,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53 - 157.

<sup>②</sup> Miria Pigato and Wenxia Tang, "China and Africa: Expanding Economic Ties in an Evolving Global Context", March 2015, pp. 9 - 10.

<sup>③</sup> FDI Intelligence, *The African Investment Report 2016: Foreign Investment Broadens Its Base*, p. 8.

<sup>④</sup>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s 2017*,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7, p. 44.

元)之后,仅为世界第四。而且,排名前三的美、英、法三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总额(1 610 亿美元),已经超过排名第四至第十的国家和地区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总额(1 440 亿美元)。<sup>①</sup> 而到2017年时,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存量为430 亿美元,排名降至第五;法国、荷兰、美国和英国占据前四位,上述四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的总额达到2 230 亿美元,而排名第五至第十的总额仅为1 460 亿美元。<sup>②</sup> 由此可见,相比于欧盟和美国,中国在非洲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

第二,中国择机重组债务或放弃贷款,而不是占有非洲国家资产。的确,近十年来,中国确实增加了对非洲的援助贷款。在一些非洲国家,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苏丹的外债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也较高,于是就有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政府会借助这些债务来推行“债务陷阱式外交”。他们经常引用的一个例证就是,由于斯里兰卡政府无力偿还对华主权债务,不得不和中国政府签订了为期99年的租约,把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租给中国,从而丧失了对该港口的控制。他们担心中国也会对它非洲的债务进行类似的重组,进而取得对该项目或领域的控制权。

然而,上述指责忽略了过去十几年间中国重组债务或放弃贷款而没有占有资产的84起案例,这其中包括了对埃塞俄比亚债务的第三次重组。<sup>③</sup> 同时,他们也无视了委内瑞拉这个案例,在委内瑞拉经济崩溃、债务破产时,中国并没有接管其国有资产。

第三,中国的援助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粮食生产等领域。就中国对非援助的国家和领域而言,不少分析人士指责中国的对外投资与援助更多的是受自身能源需求的驱动,而不是出于东道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考量。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一,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资金用途广泛,并没有集中于某一特定的项目或领域。中国提供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如桥梁、公路、铁路等)、农业和粮食生产、医疗卫生、教育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

---

<sup>①</sup> UNC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s 2018*,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8, p. 38.

<sup>②</sup> UNC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s 2019*,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9, p. 34.

<sup>③</sup> John Hurley, Scott Morris and Gailyn Portelance,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CGD Policy Pape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18, pp. 29–32.

领域。<sup>①</sup> 在2000年至2013年中国对非援助中,社会类基础设施、经济类基础设施、生产性部门和政府财政支持援助占比分别为10.0%、48.9%、12.2%和28.9%。<sup>②</sup> 截至2016年末,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在中国所有对非洲投资中总计占比达66.0%。<sup>③</sup> 其二,中国对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贷款与援助并没有显著地多于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2006年,中国对非洲非石油矿产国家的投资比重为38.6%,2016年升至58.4%,其中对资源贫乏国家的投资比重从19.6%增长到31.4%。<sup>④</sup>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放贷与援助主要是基于该国的实际需求,且有严格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政治效益论证,而不是其资源的丰富程度;在借贷资金的流入领域方面,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一般只提供借贷的额度。至于这些借款用于哪些项目,则由债务国自己决定,例如,中方根据非方的需求,对博茨瓦纳的公共住房项目和毛里求斯的排水工程施以援助。中国的贷款大多集中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和电力部门,这些部门对非洲长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sup>⑤</sup>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的受援国来说,来自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起到吸引投资的杠杆作用,并且促进国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循环。<sup>⑥</sup> 实际上,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与援助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sup>⑦</sup>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援助或贷款的额度、行业领域,还是债务国未能偿债的结果而言,实际上并不像部分西方人士所指责的那样:中国对非洲国家的一些关键项目或行业领域进行大规模援助与贷款,直至东道国无力偿还债务,然后迫使其将那些关键项目或行业领域的控制权移

① [南非] 马丁·戴维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及评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38~45页;陈默:《中国援助的非洲模式及其对非洲发展影响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6~74页、第86~97页。

② 朱玮玮、徐康宁、王美昌:《中国援助是否促进了非洲经济增长》,载《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7期,第111页。

③ 刘晨、葛顺奇:《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载《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第12页。

④ 同上文,第12~13页。

⑤ Chris Alden & Lu Jiang, "Brave New World: Debt, Industrialization and Security in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3, 2019, p. 643.

⑥ 陈玮冰、武晋:《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与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非洲39国面板数据》,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38~46页。

⑦ 朱玮玮、徐康宁、王美昌:前引文,第108~120页。



交给中国；相反，中国对非洲的借贷只占非洲债务总额的一小部分，而且中国的援助、贷款与投资并没有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国家及特定的行业领域，它是分散的。由此可见，相关指责在事实上并不成立。

## （二）中国的对非投资主要是企业行为

在第二条指责中，部分西方政客和分析人士认为，在非洲进行投资的中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大多数是中国政府控制或管理的国有企业，这些受补贴的国有企业在非洲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进而易于取得某些项目或行业领域的主导权；由于这些企业大多是由中国政府管理或控制的，所以当东道国向这些企业进行融资时，实际上是在向中国政府进行融资，企业的收购行为实际上也成了中国政府的收购行为。事实上，他们丝毫没有看到近十几年来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变化。无论是从中资企业的性质，还是竞争力的发展而言，上述指责都不能成立。

第一，私营企业是中资投资非洲的主力军。在企业性质方面，对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主要以私营企业为主。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中国私人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措施，而且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许多私营企业已经陆续迁往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sup>①</sup>其中包括不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中国私营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基于生产成本、市场潜力等因素，中国私营企业对非洲的投资迅猛增长。2002年，在21家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项目中，只有4家属私营企业；到2013年时，2282个项目中有1217个项目是私人项目，占总项目的53%；即使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中国企业在非洲约70个制造业项目中，就有66个为私人所有。<sup>②</sup>私人投资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5%。<sup>③</sup>麦肯锡集团（McKinsey）在2017年调查了非洲8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资企业超过1万家，其中90%为私营企业；在尼日利亚，私营企业比重达到95%；即使在中

---

<sup>①</sup> Haichao Fan, Faqin Lin & Lixin Tang, “Minimum Wage and Outward FDI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35, 2018, pp. 1 - 19.

<sup>②</sup> Shen Xiaofang, “Chinese Manufacturers Moving to Africa - Who? What? Where? Does Africa Benefi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Building a New Partnership with Afric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May 20, 2014.

<sup>③</sup> Miria Pigato and Wenxia Tang, “China and Africa: Expanding Economic Ties in an Evolving Global Context”, March 2015, p. 17.

国重要的石油来源国安哥拉，私营企业的比重也达到了 75%。<sup>①</sup> 另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17 年末，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有 3 413 家，其中民营企业超过 2 000 家。<sup>②</sup> 虽然上述数据统计来源不同，在非私营中企数量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营企业是中国对非投资的主体，而非国企。

第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竞争力是内生的，而非主要源于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并不仅仅是凭借优惠贷款或出口信贷补贴，而是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就外部因素而言，一方面，2008 年以来世界经济环境的新变化既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发达国家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减少，纷纷转变发展战略，开发国内市场，这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直接投资扩大了机会窗口，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和放宽境外投资的汇兑限制等，这些措施改善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环境，降低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本；而且，中国国内的高储蓄率使得这些企业在国内进行融资的成本比较低，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和融资机会。就内部因素而言，一方面，随着中国不断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企业自身也在不断地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其人才培养、品牌战略和管理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发展全球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在很早前就进入非洲市场，进行业务合作，许多经营者甚至在非洲国家工作了二三十年，他们对非洲的当地市场和风土人情等都非常了解，所以在项目的竞标中更能清楚地知道非洲人民的需求，因而也更容易中标。<sup>③</sup>

综上所述，近十几年来，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无论是其性质，还是其竞争力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中，国有企业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并且仍处于继续增长中。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竞争力的提升，并不是主要源于中国政府的支持。政府仅是为企业扩

---

①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McKinsey & Company, 2017.

② 朴英姬：《深化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新动力与新思路》，载《西亚非洲》2019 年第 5 期，第 145 页。

③ Giles Mohan & Bne Lampert, “Negotiating China: Reinserting African Agency into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African Affairs*, Vol. 112, No. 446, 2013, pp. 92 – 110.

大对非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企业者是开拓非洲市场的主体和实施者，后者的自身能力建设起到了根本性作用。因此，中企在获得非洲市场商机，不仅仅在于政府的倡导与推动，更在于非洲投资市场的变化及中国企业自身改革等内外综合因素。

如上所述，部分西方媒体大力渲染中国对非造成“债务陷阱”，炮制中国债务绑架等言论，实际上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显著增强而产生的纠结、焦虑和恐惧心态，相关指责仅是臆断，而非事实。正如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金文米·阿德西纳（Akinwumi Adesina）所言：“中国并没有试图把非洲国家带入‘债务陷阱’，而是在与其他国家一道提供至关重要的投资。”<sup>①</sup>

## 理性回应中国对非所谓“债务陷阱式外交”的相关建议

欲辨明中国对非“债务陷阱式外交”言论的真伪，需找准非洲外债形成的原因。非洲国家当下沉重的外债负担既有长期累积和遗留下来的历史原因，也受到自身经济增速、债务管理能力、外部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毫无疑问，中国对非投资和发展合作，并不会加剧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没有把非洲拖入“债务陷阱”。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洲推行“债务陷阱式外交”的指责，罔顾了中国在非洲援助和投资的事实，是对中国的不实指控。对此，中方需从两方面理性应对。

第一，对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资活动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探讨对非洲援助和投资的优化路径，尤其是拓宽和深化与非洲国家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进入 21 世纪以来，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层面，中非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深化合作的愿望。尽管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领域中各行业分布广泛，涵盖建筑业、交通运输、制造业、采矿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农业等各个领域，但建筑业、采矿业和制造业仍然是中国对非投资存量最高的行业，由此易被一些西方媒体选择性失明，聚焦能源领域，加以片面解读。虽然这是一种不实的指责，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领域和项目仍需进一步多样化，深化与非洲国家和企业

---

<sup>①</sup> 参见新浪财经网：<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8-31/doc-iicezzrq2440181.shtml>, 2019-10-09。

的多层次合作。

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应该加强对东道国的债务风险和政治风险等有关投资风险的评估能力，分散或规避投资风险。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扩展投资的领域是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sup>①</sup>从长远角度看，中国企业需发展多元化贸易投资，在非能源资源领域，如渔业、农业、食品加工、制造业和电力部门等领域增加投资。深化多层次合作，增加投资与援助领域或项目的多样化，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分散投资或援助的风险，而且还有助于提高非洲国家的出口商品类型由初级加工产品向附加值增值产品转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投资与援助的误读。

在政府层面，应进一步提升对非洲的援助有效性，合理配置援助的行业领域。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对资金也有大量的需求，对于宝贵的对非援助资金应更好地管理与使用。援助的行业领域要基于非洲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增强非洲国家发展的“造血”功能。有关民生的经济基础设施部门、生产性行业应该成为中国援助非洲的重点和优先领域。首先，中国首先应该加大对非农业领域的援助与合作。中国的农业发展经验对非洲国家具有较高可借鉴性。大力发展农业是非洲多数低收入国家脱离贫困、增加收入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加大对非洲国家农业和粮食安全的援助，不仅能够推动民生改善，增强其自主发展的能力，还能为其工业的发展积蓄力量。其次，中国应继续深化在公路、港口和工业园区等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帮助非洲国家改善经济发展的条件，增强其招商引资的能力，增进经济活力，提高非洲国家的自身发展能力。事实上，外国直接投资与援助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减债具有重要作用，<sup>②</sup>中国应该通过援助和投资来促进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以非洲国家的良好发展业绩来证伪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所谓“新殖民主义”的不实指责。

---

<sup>①</sup> 赛格、门明：《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应对》，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3期，第60~65页。

<sup>②</sup> Bill Battaile, F. Leonardo Hernández & Vivian Norambuena, “Debt Sustainabi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Unraveling Country-Specific Risk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523, 2015; Chantal Dupasquier, Patrick N. Osakw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Performance, Challenges, and Responsibilitie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7, No. 2, 2006, pp. 241-260; 隋广军、黄亮雄、黄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载《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32~43页。

第二，加强与非洲国家和西方媒体的沟通和外宣工作的力度，增强软实力建设。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多元化时代，不实报道并不少见。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蓄意传播虚假或误导信息的行为激增。这种状况的出现既是传媒技术（如电视、互联网、广播和新媒体）不断发展的结果，同时也由于那些故意误导舆论者利用自媒体等渠道，凭借愈发老练的技术手段，传播一些错误信息，以期影响舆情。尽管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提高了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非洲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发挥积极作用，显著地促进了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但仍有部分媒体人士罔顾事实，指责中国的投资与援助正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中国“债务陷阱式外交”甚嚣尘上。这种误导性指责不管是无意的，还是别有用心，不仅歪曲了中国政府的形象，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国家对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警惕与敌视，对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误解和非议往往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为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软实力建设，多渠道宣介对非援助和投资情况。在政府层面，一方面，中方应以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为主，进一步完善对非援助工作的机制建设，对外援助决策前的可行性调查研究、援助实施过程情况的反馈、受援国评价以及援助效果和影响的评估等环节，形成一条更加完整的链条，并不定期的发布对外援助的信息报告，减轻或消除非洲国家和西方媒体的疑虑。另一方面，中方可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或其他国家在援非领域的合作，扩大同它们的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增信释疑，减少它们对中国援助非洲的误解。

在企业层面，一方面，中国在非洲的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对东道国的法律和社会规则的研究与理解，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人情，积极融入当地的环境，找到企业与东道国利益的结合点，根据当地的社情民意调整经营策略，提供当地民众真正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中企应该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之间的联系，提高企业在东道国经营活动的能见度，以数据和事实说话，切实提高信息的传播的公信力及有效性，减轻或消除外界的猜忌，防止谣言或错误信息的扩散。而且，中资企业应该注重在东道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注意回馈社会，注重员工的本土化，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从而促进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借此塑造开放、合作共赢的企业形象。

## The Innocent Lender: Has China Pursued “Debt – trap Diplomacy” in Africa?

*Lu Lingyu & Gu Baomi*

**Abstract:** Sino – African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rapidly developed in the new millennium. Some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analysts condemn that it is China’s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that have caused foreign debt in African countries to skyrocket, created their risks of sovereign debt, and at the same time made these countries fall into the “debt trap” through direct and indirect investment or holding of its state owned enterprise, and eventually influenced the debtors’ foreign policy. In fact, the current level and structure of foreign debt stem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ternally, African countries lack proper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capacity to manage their debt. Externally, they experience declin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recession of global economy. Investment and assistance from China do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ir debt burden. On the one hand, China often helps relieve highly indebted African countries of their debt by canceling or restructuring their debt, rather than appropriating their national asset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has taken effective measures to encourage private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Africa. In order to counter the unfounded accusation of the West, China ought to deepen its multilevel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countries in various areas. This will not only diversify its investment flow, reduce financial risks, but also decrease the misgivings of African debtor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countries and Western media,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Key Words:** Sino – African Cooperation; “Debt – trap Diplomacy”; Investment; Aid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